

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打從二十一世紀初以來，華語科幻小說創作急遽崛起，從昔日的邊緣化文類逐漸形成一股新浪潮，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熱點。其中，以劉慈欣的《三體》系列最受關注，不僅被翻譯為英文出版，更於2015年獲得雨果獎的最佳長篇小說獎，甚至被外國著名串流平台改編製作為影集。究竟，華語科幻的興起有何獨特的時代背景？敝刊12月號將會刊出一組筆談，與讀者一起探討華語科幻的前世今生。

——編者

挑戰有關文革發動的固化敘述

董國強、樊建政二君是大陸學界首屈一指的文革史專家，其大作〈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「鬥鬼」風潮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2年6月號、8月號）史料非常豐富，顯示出極其深厚精湛的史學功力，是新近海內外文革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品。文章通過探究1966年春夏之際復旦文革的曲折演進，質疑學界關於文革發動初期的主流解釋，即所謂「預謀論」。文章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提出了非常有見地的想法，與筆

者目前正在撰寫的英文專著 *The Coming of Mao's Last Revolution: How a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m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*（《毛澤東最後革命的降臨：「文化革命」何以衍變成「文化大革命」》）亦多有契合之處，比如關於「反右」在文革初期的意義、激進文化運動在文革中的作用、〈五一六通知〉的文本解讀等。

該文試圖回答的問題是：「反動學術權威」何以在文革初期成為主要打擊對象？在主流解釋看來，這是由於各級幹部誤解、曲解或選擇性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，以「矛頭朝下」、「矛頭朝（黨）外」取代「矛頭朝上」、「矛頭朝（黨）內」，從而達到轉移目標和政治自保的目的。在董、樊二君看來，這一解釋是錯誤的。他們認為，基層幹部主導的新一場「反右」運動不僅不是陽奉陰違、「轉移鬥爭大方向」，恰恰相反，是正確理解並忠實執行以舊知識份子為主要打擊對象的運動主旨，即復旦黨委代理書記王零所謂「搞老頭子」的運動。這是一個具有突破性意義的重要觀點，筆者完全認同。不過，文章把「預謀論」作為主要批評對象，有偏題之嫌，似不夠精準、鮮明、有力。因篇

幅所限，筆者僅就以下兩點求教於二君。

其一，倘若說文革研究領域存在一種佔據統攝地位的「預謀論」解釋，讀者的第一反應極可能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有預謀的，即毛發動文革始於暗室密謀，然後逐步將鬥爭從高層推向基層、從黨內推向社會。這一解釋久已固化為史學界常識，但董、樊二君的「預謀論」另有所指，即文革初期由各級基層黨組織所主導的對於「黑鬼」、「反動權威」及文宣幹部的殘酷打擊。筆者認為，此處的問題關鍵並不完全在於基層黨委這麼做有無「預謀」，或是否出於「轉移鬥爭目標」的目的。事實上，基層黨組織主導打擊舊知識份子並非偶發或無計劃之舉，而且毋庸置疑的是，此舉至少在客觀上也的確起到了轉移目標的效果。

其二，唯有更為詳盡、系統地梳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最高層發動文革的原初意圖，或者說，自覺地、堅實地確立「文化革命」作為一個相對獨立於「文化大革命」的敘述與分析範疇，該文關於文革初期「鬥鬼」風潮及「反右」運動的新穎見解之突破性意義，才能得以充分凸現。換言之，只有從宏觀層面把「文化革命」梳理清楚，才能真正打開以原創性問題意識為驅動的歷史敘述空間，從作為激進文化運動的狹義上的「文化革命」到群眾性「文化大革命」之轉化、所涉及種種複雜張力與曲折，才有充分展開之可能。無論從史料抑或分析角度而言，這是能夠真正有力挑戰和顛覆文革史固化

解釋的前提和基礎所在。反觀此文，這恰恰是其邏輯結構鏈中的薄弱環節。文章開頭對作為文革發動綱領的〈五一六通知〉文本的解讀以及對所謂「小文革」的敘述，為此提供了良好起點，但略有遺憾的是，這些內容過於簡約，有待進一步延伸和強化。

總之，筆者以為，反思、重構有關文革發動的敘述與闡釋，需從宏觀與微觀之互動以及長時段等多維度入手，該文基於單一基層個案的微觀研究雖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，但同時又恐難充分涵納。對這些問題的延展討論，或應是另一部作品的內容。

吳一慶 多倫多

2022.9.13

考證上山下鄉的「第三種動機」

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布「最高指示」，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潮，漣漪遠擴。探掘彼時彼點毛決策的第一促因乃知青學一大關注點，秦暉先生在〈意識形態？就業困境？過河拆橋？——1968年末知青大潮興起重探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2年8月號）一文將上山下鄉拎出再探討，條分縷析，史料為據，撥蕪現真：「意識形態與解決就業恐怕都不能說是當時的第一動機；對紅衛兵卸磨殺驢應是他當時首先考慮的出發點；至於『縮小三大差別』就更是無從談起。」筆者作為八年「鄉齡」的上山下鄉受害者，只有一聲聲「原來如此」的

更沉重的歎息：我們知青一代不就是毛手中的「小白鼠」嗎？

政治人物心態雲譎波詭，且有隱藏政治意圖的本能，如赫魯曉夫(Nikita S. Khrushchev)所言，「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」。考證毛用上山下鄉結束紅衛兵運動在意識形態、解決就業之外的「第三種動機」，不僅對知青學、也是對文革學頗有分量地添磚加瓦。

秦文除考證「廣闊天地，大有作為」原始出處(1955年7月)，還緊緊抓住1968年末這一時間節點，剖析毛決策的第一動機；既梳理上山下鄉縱向坐標，更注意突出橫向背景，視域開闊，基點穩固，考據翔實，論證有力。歷史事件只能形成於歷史進程。毛發布上山下鄉「最高指示」，直接觸發點當然在於時政：結束紅衛兵運動。此時，紅衛兵已完成為「倒劉」的「戰略目標」，且造成1967至1968年經濟大滑坡(大幅負增長)，政府財政赤字嚴重，各地出現血腥大武鬥。盡快消弭動亂，成為第一政治急務。

當然，經濟方面的就業困境、意識形態的邏輯沿續，也是毛決策不可忽視的重要背景，形成1968年底上山下鄉大潮兩大主要促因。若無此前紅色意識形態架設的乾柴(「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」、「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」)，一根火柴不可能迅速星火燎原，短期內就形成洶洶大潮。上山下鄉將紅衛兵送入「廣闊天地」，既迅速降解紅衛兵運動(不能繼續聚集鬧事)，順便解決就業壓力，還維護紅色意識形態(符合「接班人」理論)，可謂「一舉三得」。

秦文考證毛何以不給紅衛兵鄉村改造典型的榮銜，將之褫奪「毛主席身邊的青年」名分，貶為接受「再教育」者，結合1968年7月28日毛面斥紅衛兵五大領袖「輪到小將犯錯誤」，形成論據邏輯鏈。

一時之政決於力，千秋之事決於理。不符合國家利益的上山下鄉與其他政治運動一樣，不可能得到歷史肯定，畢竟現代社會的方向是科技化、智能化，而非體力化、原始化。隨着城鎮出現用工荒，下鄉青年回城成為剛性需要，即便「四人幫」不倒，「扎根一輩子」也唱不下去了。就算「鍛煉思想」很必要，不能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嗎？工人階級不是比農民階級更先進嗎？各級官吏、各地青年、各位家長再愚忠、再「發燒」，也看得清清楚楚：城裏費勁費力地動員知青下鄉，鄉村再費勁費力地選拔知青回城，兩頭來回折騰，毫無必要，為政治而政治，何苦何必？

所謂歷史進步、社會進化，即體現於能認清昔時的落後與荒謬(尤其根本原因)。關係一代知青命運的偌大決策，任由一人拿捏，至少二千萬城鎮知青被剝奪受教育權、失去擇居擇業自由(更可悲的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失去的權利)。毛可以不考慮一代知青的前途、知青家長的感受、農村農民的利益、國家發展的需要，以一己之見成天下之策，億萬人之命運操於一人之手。讀史明鑒，不受自由平等、民主民權、共和憲政凝結的一系列關鍵性人文價值約束的權力太可怕了。

裴毅然 普林斯頓

2022.9.21